

6571 6.8

0197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演变”的 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曹 平 王诚宏 伊胜利 陈国权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阐述了西方帝国主义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原因及历史过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来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经验教训。本文是较为全面阐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论文,文中的三个部分都提出了作者的独自观点,特别是文中所总结的我党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的反和平演变斗争具有借鉴意义。这些历史经验主要是: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第二,克服腐败现象,永葆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第三,增强执政意识,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第四,维护党的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别存在;第五,努力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六,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今年7月,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过去的七十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发展和逐步胜利的七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愈益结合的七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七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其自身建设、反对内部腐化蜕变和防止外来“和平演变”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七十年。此时,我们面对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狂潮,纵观变化了的世界政治格局,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巩固,是颇有益处的。

“和平演变”战略,亦称“解放政策”。它是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失败以后或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得使武力成为不现实的选择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企图运用各种和平手段来战胜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原则。

众所周知,自从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孕育而生并在世界上取得世人瞩目的胜利之后,国际反对势力一天也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其战略策略的演变,经历了“扼杀”、“遏制”、“和平演变”战略三个大的阶段。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诞生开始,帝国主义头目之一的丘吉尔首先提出了“扼杀”战略,接着公开发动直接武装干涉,企图把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红色摇篮”里;从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中期,帝国主义将“扼杀”战略转为“遏制”战略,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包围、武力威胁、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防止共产主义运动蔓延;在其战略策略一一受挫之后于五十年代后期,帝国主义逐渐改行“和平演变”战略,以期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策略的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的。

1953年1月,杜勒斯在准备就任美国国务卿时就提出,美国要推行一项“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来替代已被认为无效的“遏制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①在这里,他所讲的“被奴役的人民”,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他所讲的“战争以外的方法”,指的是“和平的方法”,即以“军事威慑”作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方渗透和演变。以后在1958年,他又提出要全力以赴地执行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②。他寄希望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

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力图策动和配合这些国家内部的残余资本主义势力搞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由此,搞“和平演变”一词与杜勒斯连在了一起,“杜勒斯”的名字也就成了搞“和平演变”的代名词和同义语。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和“冷战”政策,军备竞赛逐渐升级,东西方紧张对峙的国际形势迫使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没有能够充分施展,但仍继续鼓吹和推行这种战略。并把主要矛头指向了东欧国家。肯尼迪说,东欧国家“是它铁甲里面的脆弱部分,是一个潜在的炎症根源”。这里的“它”,显然是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逐渐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这期间帝国主义开始利用不断扩大的东西方交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与实行改革之机,更疯狂露骨地贯彻实施“和平演变”战略。1988年,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总结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经验,论述了通过“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手段。他强调当前在东欧“进行我们所希望的和平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西方的“目标是使东欧国家‘芬兰化’”;同时要把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延伸到苏联境内”,要利用广播和信息技术这一“思想战线上的有效武器”。1989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被他自己称作是美国“九十年代的新战略”——“超越遏制”战略,这一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它要改变以往“遏制”战略的防守态势而更富有进攻性;同年7月,这位政界要人又提出要用二、三十年时间打一场“无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最终解决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历史性较量”。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搞“文化西方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极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59年10月,肯尼迪曾宣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磐石”,西方要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更密切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③1980年5月,尼克松提出:“我们不应怕进行宣传战”,“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以不进行战争的方法使用我们的力量。”^④1988年3月,尼克松又提出要利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工具进入“思想战场”。在中国,他们正是这样干的。他们网罗了中国大陆上的一伙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并唆使总部设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参与策化北京动乱,“美国之音”及其他标榜“自由”的西方新闻媒介,对中国的动乱“自由”地造谣惑众,并为之推波助澜。

二是在政治方面,搞“政治多元化”。他们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极力鼓吹西方的多党制,并诱迫社会主义国家效法西方的政治模式实行多元化体制。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争“人权、自由、民主”为幌子,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合作者,培植所谓“民主分子”,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支持和鼓励这些反对派发展成为政治组织,或在共产党内部寻觅代理人,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内应,进而达到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之目的。1986年3月,里根曾声称,美国要对全世界“进行强有力的、满怀信心的和不间断的领导”,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变得“有多元化体制”、“有自由”而无“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暴政”,美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进行长期斗争。^⑤在

中国,他们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支持并收买了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鼓动并支持这些人策划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那场以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为罪恶目的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国平暴斗争胜利后,又是他们为这些畏罪潜逃的动乱、暴乱分子提供庇护场所和继续进行反华反共的基地。

三是在经济方面,搞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他们通过所谓的“支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使之逐渐“溶入”到“国际社会”,即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私有化。他们以发展双边贸易、提供经济援助、贷款、合作和技术转让为诱饵,软硬兼施,为其政治战略目标服务。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宣称“美国、西欧、日本应该坚持,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的互换条件是进行正式制定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改革。”1988年8月,尼克松撰文供认:“我们必须向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提供间接的物质支持。西方工会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支持便是一个范例。”^⑥在中国,他们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恶性膨胀时,用金钱和物质支持了中国的动乱、暴乱分子。中国平暴斗争胜利后,他们又发起并组织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行动。

历史和现实证明,帝国主义首脑们,从杜勒斯、肯尼迪到尼克松、里根和布什,无一不是在做着“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迷梦。无论是“解放政策”不战而胜的方法也好,还是“超越遏制”的新战略也好,提法上虽有差异,但其实质却都是一样的。若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交替使用着的反革命战略策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并用。在当今时代,正如江泽民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中指出的,他们“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和平演变”这一帝国主义的战略企图已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逞,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剧变就是明证。这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根本性变化。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确实存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各种有效的抵制措施,形成我们的反“和平演变”的战略。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她是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她一贯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不断在斗争中增强对“和平演变”的免疫力。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尚未出笼时,我们党针对帝国主义提出的一种鼓励、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阴谋企图时,就提出了警惕和预防人们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任务。这就为后来我们党的反“和平演变”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炮制出来后的三十余年里,我

们党一直同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使帝国主义预言家们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幻梦未能如愿。

1949年3月,毛泽东鉴于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党并且面临胜利和权力的考验的情况,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以防止党自身的蜕化变质。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⑦随后,他又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据实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提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⑧向即将胜利了的党和人民敲响了拒腐蚀防蜕变的警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们党先后开展了镇反和“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斗争。1951年12月,毛泽东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⑨他在1952年《元旦祝辞》中又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⑩“三反”、“五反”等斗争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挽救、教育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防腐蚀能力,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当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民进行教育,提高了对帝国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警惕性。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1959年11月,他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又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以后他又一针见血地提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破产。”^⑪

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曾努力探索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并提出了要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在正确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上,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曾作过有益的尝试,五十年代后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进行过一线、二线的划分;六十年代前期党又明确提出了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原则条件,强调我们“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

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⑫这期间,我国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它对于防止党内腐败、改善党群关系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以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战略思想。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没有能够作出准确、恰如其分的解释,从而大大妨碍了他对党内“左”倾错误进行的批评和纠正。以至把刘少奇等针对苏联模式进行的改革,统统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进而开展了那场“以阶级斗争为纲”,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应该说是好的,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党内的腐败现象。但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并且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使运动与出发点相悖,结果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在于抓了阶级斗争,而在于摆错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此之后,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保持高度的警惕。1979年3月,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⑬1982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⑭随后,他又相继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任务。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原则立场,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的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上没有贯彻,从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次次泛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从国内范围来讲,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的结果;从国际范围来讲,实质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一次严重斗争。中国平暴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力挽狂澜,取得的一次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伟大胜利,它不但顶住了外来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同时它又向人们提供了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又抵御“和平演变”的斗争经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⑮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其反共性质是特别鲜明的。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在这场两个阶级的大较量中,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这场反渗透、反颠覆、反演变斗争的长期性,是由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长期性决定的。为了坚持和改

善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是我们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总任务都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从七个方面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对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防止脱离群众,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奠定反对“和平演变”的群众基础,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是一个庞大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其实践的结果却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因此,这些国家在建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之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所俘虏。虽然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两种制度较量的长期性,同时也就决定了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在当今,由西方资本主义挑起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仍在继续。其战略手法时常变换:或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其内部的所谓“自由主义力量”身上,搞内外结合;或把威慑同绥和结合起来,“寓和平于实力”之中,搞软硬结合;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压、诱、时压时诱、诱压并重,搞打拉结合。同时,他们还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强调要逐步地、慎重地、循序渐进地施行他们的计划。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政策在和平环境中的产物,既是当前国际形势缓和趋势的产物,也是潜藏在这个趋势底下的一股反共逆流。不幸而言中的是,当年肯尼迪提出的“只有通过和平的转变,东欧才能得到自由”^{①⑥}的“和平演变”预想,三十年后在一些国家灵验了,奏效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今天,不仅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和严重的危险了。在我国内,搞“和平演变”确有那么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在我们的社会内,也确实存在着极少数羡慕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而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煽动者们,又“恰恰就在共产党里”。^{①⑦}因此,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必须坚决而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阴谋,必须提高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和始终一贯地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三

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斗争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是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当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焦点。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们搞“和平演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力反对的,也正是这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年来,在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愈演愈烈,并酿成动乱以至暴乱,就是因为放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⑬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深入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共产党组织也决不可能设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有所退让。不这样,就会给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以可乘之机,就会使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成变成了资本主义化。

第二,克服腐败现象,永葆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党的建设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党的建设中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指导思想。国际风云的变幻说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国内的一些敌对分子也从来都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执政的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得我们的一些党员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改变中国党的颜色的“和平演变”阴谋逐渐失去警觉,阶级斗争观念淡薄,自身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逐涌下,在党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思想理论混乱,给改革开放中党的建设的实践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把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斗争放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总格局中加以考察,充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切实搞好廉政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第三,增强执政意识,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入手中

强化执政意识,坚持党的领导,使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执政的无产阶级党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些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加上我们共产党内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的滋长,使得我们的党和人民共和国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煽动策划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险些毁于一旦。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执政意识,否则,一旦丧失了执政的地位,将意味着从此打开了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门。同时,它还告诉我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只要党内的最高领导层不出问题,其领导核心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够带领全党经得起任

何风浪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切实加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坚决地把那些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品质不好、看风使舵的“骑墙派”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①来接班,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第四,维护党的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别的存在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只有团结统一的党,才能有全党公认的理论基础和纲领路线,反之,是不可能有什么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它是党实现领导作用和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些年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搞“和平演变”,在国际的大气候下,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鼓吹所谓的“精英”政治,鼓吹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主张全盘西化。其实质,就是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破坏人民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反对党,取消共产党,取代共产党。在这方面,东欧一些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上台执政,改宪法、更国名、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短时期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来识破这个阴谋企图,切实加强并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更不允许进行派别活动,这不是由于别的什么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特点和党性党心决定的。历史上的张国焘搞第二中央、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现时中党内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人,也同样为党的纪律所不容。否则,党内如果任其反对派存在并继续发展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把党内监督引向歧途,组织分裂,亡党亡国。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时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斗争。

第五,努力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年来,我们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提出了一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总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不能取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坚决克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积极稳妥地发展国民经济,逐年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多更好地体现。

第六,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保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同时它也是我们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万年大计。国际敌对势力特别重视对青少年一代和年轻干部的思想“熏陶”,十分舍得花本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培养“亲西方的下一代”,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

上。这些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致使一些青年和其他一些人追求享受、崇洋媚外,不思进取、政治糊涂。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切实抓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对青少年一代和年轻干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居安思危,增强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意识,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的侵蚀。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去指导工作,去占领阵地。坚决批判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清除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扫除散布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黄色文化。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时代,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必须要有坚实的防变能力,既要防止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公开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同时又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虽然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当今已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得逞,但它并不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航向的根本改变。

社会主义,对于觉悟的工人阶级来说,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它永远“是一个庄严的信念”。^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③

注:

①杜勒斯: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2页。

②杜勒斯:1958年1月16日《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4页。

③④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说》,《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15、16页。

④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18、19页。

⑤里根:《对外政策咨文》,1986年3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

⑥尼克松:《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1988年8月28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⑦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1326、1328、1372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60页。

⑪⑫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⑬⑭《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0、372页。

⑮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页。

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5页。

⑰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64页。

⑱《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84页。

⑲《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页。

⑭毛泽东：1957年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